

谁更重要？

——政治参与行为和主观绩效对政治信任影响的比较分析

杨鸣宇*

【摘要】改革开放后，中国政府获取合法性的方式被形容为绩效合法性。已有的研究显示中国的政治信任的影响因素中，市民基于政府管治绩效评价所形成的主观绩效是相对而言最有影响力的变量。但另一方政治参与行为也证实和政治信任相关，而且近年发生的一系列基于环境邻避问题引起的事件显示市民开始主动地通过不同的参与行为来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这些诉求和政府经济绩效的取向存在明显的对立。因此对于习惯以绩效合法性为管治基础的政府而言，维持和提高市民的主观绩效是否仍然是政府获取合法性的有效方式？上述两者哪个对政治信任又更有影响？论文运用亚洲民主调查（2008）对这些进行了分析。主要发现是市民对国家经济现状、政治制度的运作效率和社会问题解决能力的主观满意度是三个对政治信任最有影响力的变量，三者的影响力超过所有政治参与行为的影响。这些发现显示政府目前以发展经济为主，兼顾社会福利并不断提高民生问题解决能力来获取政治信任的管治方式，至少现阶段来说仍然是理性和有效的。

【关键词】 政治信任 主观绩效 政治参与

【中图分类号】 D66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 - 2486 (2013) 02 - 0052 - 20

* 杨鸣宇，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感谢匿名评审人的意见。

一、问题的提出

在近几十年,西方民主国家出现了所谓“民主赤字”(Democratic Deficit)的现象,市民普遍出现对政府不信任或降低信任的情况(Dalton, 2004; Norris, 2011; Nye et al., 1997; Pharr & Putnam, 2000)。相比较而言,已有研究显示中国政府一直享有非常高的政治信任(Chen, 2004; Li, 2004; Shi, 2001)。近年的研究发现虽然文化和政治宣传等因素和政治信任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但是影响亦比不上市民基于政府管治绩效评价形成的主观满意度(Yang & Tang, 2010; 马德勇 & 王正绪, 2012)。换言之,对政府管治绩效的主观满意度是一个相对而言对政治信任更为重要的预测变量(predictor),我们可以称之为主观绩效。

然而,政治信任也会受到管治过程中政府和市民之间的互动行为的影响,比如说政治参与行为。在中国的背景下,诸如村镇、地方人大选举及上访等政治参与行被已有研究证实对政治信任存在影响(Li, 2004; Manion, 2006; Tan & Qiushui, 2007)。而近年发生的一系列因为环境邻避问题(Not In My Backyard)而引起的集体行动,如厦门PX、启东和什邡等事件,更是与经济绩效的发展取向相对立。这些可能引发环境污染的项目虽然能够为当地的经济带来可观的增长,但市民亦不愿意以自己的生活环境作为代价。这似乎与英格哈特(Inglehart, 1977)所描绘的后物质主义下更在乎主观满足感(Subjective Well-being)的市民的情况相吻合,随着基本物质需求的满足、教育程度的提高和政治参与技巧的获得,可能改变对政治机构的管治需求,更积极的进行政治参与,并可能由此降低对政府的信任。

由此我们不禁要问,主观绩效和政治参与行为,它们何者对政治信任影响更大?通过给予市民感受得到的好处是否仍然是政府获取合法性的有效手段?这对于中国目前以绩效合法性为基础的管治又意味着什么?论文将运用亚洲民主调查(2008)的数据对上述的问题进行分析和讨论。

二、文献回顾和分析思路

(一) 主观绩效对政治信任的影响

政治信任一般被定义为市民对于政府或政治系统能够产出和他们预期结果相一致的信念或信心 (Easton, 1965; Hetherington, 1998; Miller, 1974)。这个概念被认为有着多个方面的重要性, 比如说它被认为是政治合法性的一个基本组成部分 (Easton, 1965)。较高的政治信任能够使政府无须使用强制性手段来获取市民认可其做出的决定 (Gamson, 1968)。而较低的政治信任则可能使政府无法做出有效的管治 (Citrin, 1974)。长期的政治信任缺失则可能会导致政权的衰弱和崩溃。对于政治信任的分析通常是从文化和制度两个角度进行切入。两者的区别是文化理论认为政治信任是外生的, 信任被假设潜藏在文化系统里, 这套系统在人的早期成长和社会化阶段就产生影响, 因此政治信任被视为是人际信任 (interpersonal trust) 推广到政治系统的一种表现 (Almond & Verba, 1963; Inglehart, 1997; Putnam, 1993)。而制度理论提供的解释则认为政治信任是内生的, 对于政治制度的信任基于理性的计算。它来自个人对于制度表现的评价 (March, 1988; North, 1990)。但亦有研究发现对于中欧、东欧等由前共产主义国家转型而成新民主政体来说, 制度理论对政治信任的解释力要比文化理论的解释力强 (Mishler & Rose, 2001)。中国的政治信任研究基本是沿着上述两个角度展开, 并且各自得到实证数据的支持。比如史天健 (2001) 运用 1993 年在中国和台湾的调查数据对两者政治信任构成的比较中, 发现制度因素确实对政治信任存在影响, 但是文化因素对于政治信任的影响仍然显著。并且文化因素可以解释中国和台湾两者政治信任水平中三分二的差异。马得勇 (2007) 运用亚洲民主调查 (2001—2003) 的数据分析亚洲 8 个国家和地区的政治信任构成也发现, 政治威权主义价值观不单对中国的政治信任, 而且对日本、韩国和台湾等国家地区也有显著的影响。胡荣等 (2011) 在厦门市的调查数据分析显示市

民对政府绩效的满意度能够显著增加政治信任。而孟天广和杨明（2012）运用全国性的调查数据也发现市民对于经济增长、民生福利和公共产品供给的主观评价对政治信任有显著的影响。近来的研究进一步发现在同时控制文化、现代化和主观绩效等变量的情况下，虽然文化等变量对政治信任仍存在显著影响，但是重要性不及主观绩效（Yang & Tang, 2010）。

（二）政治参与行为对中国政治信任的影响

目前关于政治参与行为对中国政治信任影响的研究较多集中在两类行为：投票和抗争性行为。前者被视为是中国政府对政治制度进行改革或制度化的尝试，后者则因为对现存政治秩序存在挑战性而受到关注。选举在中国无论是村镇还是地方人大选举目前仍然是不完全竞争性的，也不完全合乎民主选举的原则。因此对于市民为何会参与投票研究者有着不同的解释。史天健认为虽然中国目前的选举形式只能给予市民有限的选择，但是市民仍然可能通过投票去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因此市民参与投票并不是为了表示对政权的支持，而是可以借此机会来达到诸如惩罚滥用权力或腐败的官员这样的目的（Shi, 1999）。陈捷和钟扬利用在北京搜集的调查数据亦得到和史天健相反的结论，即那些支持现政权的市民更可能参与投票，而且反腐倾向对于投票的倾向影响并不显著（Chen & Zhong, 2002）。而墨宁则发现村镇选举对于地方领导的信任存在正相关关系（Manion, 2006）。至于被欧博文、李连江称之为“依法抗争”的抗争性行为虽然对政府的权威存在一定的挑战性，但起因通常不是政治性的。相反是市民对官员失职或者是对既定政策、法律或规则的不遵守和违反的响应和带有惩罚性的行为（O'Brien, 1996; O'Brien & Li, 2006: 2-3）。在缺乏足够制度化渠道解决市民和政府之间的纠纷的情况下，集体上访被认为仍然是处理类似纠纷最常用的途径（Cai, 2008b）。而这些行为对政治信任的影响亦是多方面的，取决于抗议的结果。李连江发现如果上访者满意向中央上访取得的结果或者认为上访至少取得了一定的效果，则他们更可能相信中央看重农民或者进京上访是有用的。李认为虽然这不能直接理解为上访者提升了对中央的信任，但是正面

的结果有助肯定和维持上访者原有的信任。相反如果上访者受到了地方政府的压制则会减低对中央的信任 (Li, 2008)。相比较上述两种行为, 像市民联系官员的行为对政治信任影响的研究仍然非常有限。陈捷认为市民联系官员的原因是他们仍然掌握着很多市民日常生活赖以依靠的资源如就业、住房、教育等, 由此推论那些拥有较低具体支持 (specific support) 和不满资源分配结果的市民更可能使用这类行为来尝试改变政策的结果 (Chen, 2004: 161 - 162, 168)。然而联系官员往往是通过个人和官员之间的纽带关系 (patron-client ties) 来进行, 要维持这种关系需要投入一定的时间和资源, 但这并不是利益诉求一定能取得成功的保证, 因此并不是所有人都能够使用这类行为 (Shi, 1997: 253 - 257)。已有的相关研究较为关注市场化改革中出现的民营企业家和政府之间的关系和政治态度。旺克在厦门的调研和访谈发现市场化改革并未使民营企业家抗拒和政府官员之间的纽带关系。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这些纽带关系可以增加彼此之间的信任, 使双方的行为更加具有可预期性, 同时可以降低中央政策的变动在地方政策执行时的影响 (Wank, 1999: 33 - 40)。蔡欣怡则发现民营企业家在和政府发生政策纠纷时多数会使用所谓“接受性行为” (Acceptant Behavior) 来处理。类似行为的特点是使用非正式的途径来处理纠纷, 避免破坏与政府机构之间的关系 (Tsai, 2007: 106 - 108, 114 - 118)。而陈捷和迪克森最近的研究也显示民营企业家直接联系官员来表达利益诉求所取得结果的满意比例很高 (平均超过七成)。另外与已有研究一致的是影响他们对政府支持最为重要的变量是对生活状况的主观满意度和政府的绩效表现 (Chen & Dickson, 2010: 115 - 121, 126 - 127)。然而, 上述研究都是针对民营企业家这类群体, 关于联系官员对政治信任的一般性影响, 目前仍然所知不多。

(三) 政治参与行为、主观绩效和政治信任关系的分析框架

根据上述对已有文献的回顾和论文的研究问题, 参与行为、主观绩效和政治信任的关系的分析可以分解为以下三个模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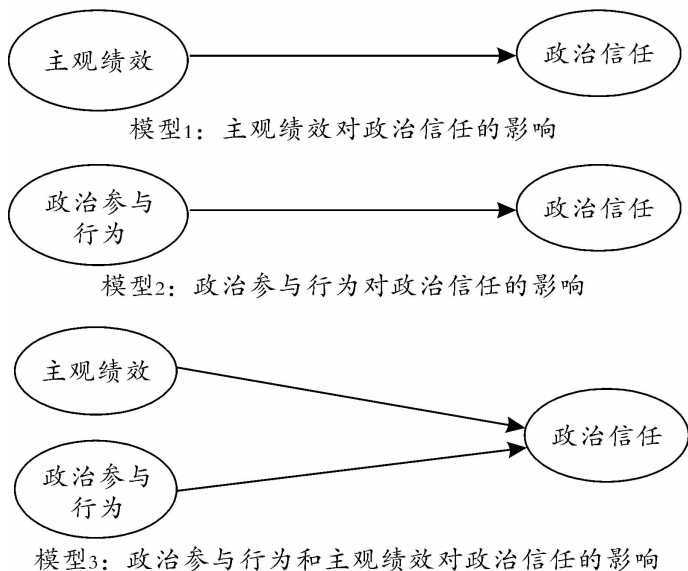


图1 政治信任影响的分析模型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模型1和模型2分别考虑了主观满足感和政治参与行为对政治信任的影响。这两个因素被已有的研究证实对政治信任各自存在影响。在这里我们考察它们对政治信任的影响主要是为了与已有研究以及模型3的结果进行对比。模型3是本文关注的问题,在这个模型里我们同时考虑了主观绩效和政治参与行为两者对政治信任的影响。这可以让我们在分析它们对政治信任的共同影响的同时比较两者影响力的大小。

比较政治参与行为和主观绩效对政治信任的影响力,在已有研究中,王正绪(Wang, 2005)和王正绪及马德勇(2012)已经进行了一些探索,但是它们的关注点和本研究不尽相同。前者的研究基本是沿着英格哈特的理论进行,因此在检验中国是否出现后物质主义的“批判性市民”(critical citizens)时,它是通过所谓的“自我表达因子”(self-expression value factor)而不是实际的政治参与行为来进行。这个因子是由一系列诸如拒绝男性中心主义(rejecting male-centric social relations)、拒绝宗法信仰(rejection of patriarchal beliefs)和民主诉求(democratic aspirations)等价值取向组成。在控制了与主观满足感相关的变量后,自我表达因子对政治信任的影响就不再显着。由于王的研究主要关注的是

检验中国是否出现了所谓的“批判性市民”（critical citizen），因此它并没比较两者对政治信任影响力的大小，而且考虑的也不是实际的政治参与行为。而后者在控制了政府服务绩效、制度公正和威权主义等变量的同时考虑了一些政治参与制度创新如公推直选对地方政府合法性的影响，结论是政府的服务绩效是影响地方政府合法性的最重要因素，其次是制度的公正性，威权主义价值观则最弱。而所有被考虑到的政治制度创新中只有公推直选制度有助提高地方政府的合法性。然而该研究使用的并不是全国性的样本，考虑的政治参与行为也较为单一，例如没有考虑其他诸如抗争性行为 and 官员联系等可能会影响政治信任的行为。因此可以说通过实证调查数据比较政治参与行为和主观绩效两者对政治信任影响力的研究还比较有限。基于上述的原因，研究希望借助全国性的数据对这个问题进行分析。

三、数据和变量的描述及量度

（一）数据

亚洲民主调查（Asia Barometer）是一个跨国性的调查计划，由台湾大学人文社会高等研究院和台湾中央研究院政治所筹备处负责或支持其他亚洲国家或地区完成的一项有关民主、治理、发展评估与态度的社会调查。其中第二波调查的中国部份由北京大学中国国情研究中心在2007年11月至2009年3月间完成。该次调查采用多阶段分层和比例抽样方法调查了除西藏地区之外的18岁以上的人口，通过面谈的方式取得了5 098个样本。各阶段的抽样单位为：初级抽样单位农村地区为县，城市地区为市，自治区为区。二级抽样为乡镇、街道和区。三级抽样单位为居民（村民、小区）委会。我们根据实际的城镇比例和人口结构对数据进行了加权处理，使之成为一个能够代表全国成年人口的随机样本。

（二）因变量

研究的因变量是市民对不同政府机构的信任，对政治信任的衡量通过以下

问题来获得“我将会讲出一系列机构的名称，请你对其中每一个机构的信任程度进行评价”。回答的情况见表1。

表1 对政治机构的信任程度

项目	完全不可信	比较不可信	比较可信	非常可信	总数
中央政府	0.25%	5.07%	24.68%	70.00%	4 736
地方政府	3.26%	37.38%	38.83%	20.52%	4 751
中国共产党	0.39%	6.62%	24.05%	68.94%	4 836
人民代表大会	0.42%	6.74%	26.02%	66.83%	4 555
公务人员	2.69%	41.95%	36.52%	18.84%	4 575
法院	1.81%	21.51%	38.74%	37.94%	4 639
公安机关	1.94%	25.87%	35.76%	36.43%	4 754

注：缺失值被排除。

资料来源：亚洲民主调查（2008）。

这7个项目的Cronbach's Alpha系数为0.8818。而由表2可以看出，这7个项目可以通过主成份因子法（principal component factoring）被简化为1个因子，我们称之为政治信任因子。

表2 政治信任的因子分析

项目	因子分析
	政治信任因子
中央政府	0.793
地方政府	0.728
中国共产党	0.785
人民代表大会	0.766
公务人员	0.782
法院	0.760
公安机关	0.781
特征值	4.168
解释方差	59.55%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三) 自变量

论文的自变量包括控制变量和解释变量。前者包括性别、年龄、教育程度、家庭经济状况、对政治新闻的关注程度、对政治的兴趣和国民荣誉感，对控制变量的选择参考了已有研究（如 Wang, 2005；Yang & Tang, 2010）。这些变量被认为可能和政治信任存在相关关系。后者由主观绩效和政治参与行为两部分组成。其中主观绩效通过经济状况、政治制度运作效率以及社会问题的解决能力三方面的主观满意度评价来量度。在已有研究里经济状况和政治制度运作效率的评价是衡量政府绩效时常用的指标（如孟天广、杨明，2012；Wang, 2005）。在本研究里我们继续沿用。同时我们加入社会问题的解决能力这项指标。理由是除了经济绩效外，能否解决市民关心的各种社会问题也是绩效合法性的重要来源（Zhao, 2009），它将影响到市民对政府执政能力的评价。因此加入这项指标能使对主观绩效的衡量更为全面。

1. 经济状况评价

对经济状况的评价分为国家和家庭两个部份，受访者要求对目前、过去几年和未来几年国家和家庭经济状况进行评价或预期。回答情况见表 3：

表 3 对经济状况的评价

经济状况 评价	目前		经济状况 评价	过去几年		未来几年	
	国家	家庭		国家	家庭	国家	家庭
非常恶劣	0.22%	3.70%	更恶劣	0.35%	1.47%	0.16%	1.00%
恶劣	4.18%	17.15%	恶劣一点	1.37%	4.58%	0.57%	3.31%
过得去	9.24%	27.88%	差不多	2.88%	11.85%	2.46%	7.97%
良好	63.60%	46.93%	好一点	52.48%	62.25%	56.36%	64.70%
非常良好	22.77%	4.33%	好很多	42.92%	19.84%	40.46%	23.02%
总数	4 621	5 054	总数	4 823	5 020	4 397	4 405

注：缺失值被排除。

资料来源：亚洲民主调查（2008）。

由表 3 可见, 大多数的评价落入了良好和非常良好或好一点和好很多这样的正面评价里。超过八成的样本评价目前国家的经济状况是良好或非常良好, 而相同的评价在家庭经济状况上只有约为五成。另外值得注意的是超过九成的样本认为国家过去几年的经济状况好一点或好很多, 而且预期未来几年经济状况会如此的也超过九成。类似的评价也出现在对过去和未来几年家庭的经济状况评价上, 只不过相对国家的经济状况评价而言平均低了约为十个百分点。

2. 政治制度运作效率评价

对政治制度运作效率的评价通过以下问题来量度“总的来说, 你有多满意或多不满意民主制度在你们国家的运行状况?”。然而中国的政治制度并不是西方标准下的民主制度。因此这条问题可以理解为市民对于现行政治制度运作效率的满意程度^①, 回答情况见表 4:

表 4 表 4 对政治制度运作效率的评价

政治制度运作效率的评价	百分比
非常不满意	1.20%
不太满意	10.17%
还算满意	71.63%
非常满意	17.00%
总数	3 994

注: 缺失值被排除。

资料来源: 亚洲民主调查 (2008)

由表 4 可见市民对政治制度运作效率的满意度非常的高, 选择“还算满意”或“非常满意”两者的比例接近九成。

3. 社会问题的解决能力评价

评价政府社会问题的解决能力由以下问题进行量度“政府在未来五年内有多大可能解决你认为最重要的社会问题?”。回答情况见表 5:

^① 更详细的解释可以参考 (Wang, 2005)。

表 5 对政府解决社会问题能力的评价

社会问题解决能力的评价	百分比
非常可能	16.03%
可能	68.39%
比较不可能	13.03%
不可能	2.55%
总数	3 132

注：缺失值被排除。

资料来源：亚洲民主动态调查（2008）。

表 5 显示大多数市民对社会问题能够得到解决抱有乐观的态度，选择“可能”或“非常可能”的比例超过了八成。

4. 政治参与行为

对政治参与行为的量度通过下面三条问题进行：①“在过去三年里，你有否因为个人、家庭或邻居原因，又或者是政府官员和政策问题曾经、多于一次或者从未有过下列行为？”②“以下行为可能有时会被使用，请你告诉我们在过去三年里你是否曾经、多于一次或者从未有过下列行为？”③“很多人可能因为远离家乡、生病或者没有时间等原因没有去投票，请问你有否在最近一次选举里投票？”回答情况见表 6。

表 6 市民过去三年里的政治参与行为

政治参与行为	百分比	总数
联系政府官员	25.96%	4 534
联系不同行政级别的人大代表	3.15%	4 478
联系党政机关	3.55%	4 419
联系有影响的人士	14.39%	4 490
拒绝交税或者费用给政府	2.18%	4 452
参加游行或示威	1.15%	4 504
投票(农村/地方人大选举)	74.68	3 776

注：缺失值被排除。

资料来源：亚洲民主调查（2008）。

表6所列的项目涉及到三类不同的政治参与行为,即制度性的参与行为如投票。常规性的参与行为如联系政府官员和非常规的参与行为如游行或示威。由百份比可见,投票和常规性的参与行为是市民参与最多的政治参与行为。

四、研究发现

为了分析比较政治参与行为和主观绩效对政治信任的影响,我们构建了三个统计分析模型。模型1只考虑了控制变量和政治参与行为的影响。由模型1

表7 政治参与行为和主观绩效对政治信任的影响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控制变量 ^b			
男性	-0.063 ** (0.033)	-0.032 (0.024)	-0.024 (0.025)
年龄	-0.045 (0.001)	0.037 (0.000)	0.019 (0.000)
教育程度	-0.045 (0.030)	-0.048 * (0.019)	-0.033 (0.022)
家庭收入	0.054 * (0.020)	0.049 (0.016)	0.041 (0.019)
关注政治新闻	-0.093 *** (0.016)	-0.010 (0.012)	-0.038 (0.012)
对政治感兴趣	-0.084 ** (0.063)	-0.016 (0.042)	-0.010 (0.045)
国民荣誉感	-0.065 * (0.028)	-0.050 * (0.021)	-0.047 (0.020)
政治参与行为			
联系官员	0.014 (0.036)		-0.023 (0.029)
联系人大代表	0.020 (0.134)		-0.012 (0.067)

(续上表)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联系党政机关	-0.024 (0.093)		-0.005 (0.071)
联系有影响的人	-0.054* (0.048)		-0.040 (0.040)
拒绝交税或费用	0.000 (0.107)		-0.027 (0.081)
游行或示威	-0.054*** (0.099)		-0.070*** (0.097)
投票	-0.003 (0.044)		0.046 (0.034)
主观绩效 ^c			
国家经济现状		0.091** (0.023)	0.115*** (0.025)
国家经济回顾		0.014 (0.031)	0.083* (0.030)
国家经济预期		0.018 (0.017)	0.024 (0.016)
家庭经济现状		-0.037 (0.018)	-0.075 (0.023)
家庭经济回顾		0.066* (0.019)	0.041 (0.019)
家庭经济预期		0.076* (0.016)	0.066* (0.014)
政制运作效率		0.148*** (0.023)	0.190*** (0.023)
社会问题的解决		-0.051* (0.005)	-0.045 (0.005)
<i>N</i>	2803	3447	2328
<i>R</i> ²	0.046	0.079	0.125

注: a. 三个模型均使用最小二乘方差模型 (OLS)。数据已经过加权处理, 模型系数是标准化回归系数, 括内中数字为稳健标准误 (robust standard error)。显著性水平: * $p < 0.05$, ** $p < 0.01$, *** $p < 0.001$ 。b. 教育程度“中小学及以下教育程度”=1; “中学教育程度”=2; “大专及以上教育程度”=3。家庭收入“能够储蓄”=1; “收支平衡”=2; “入不敷支”=3。关注政治新闻“少于一周一次”=1; “一周一到次”=2; “一周数次”=3; “每天都关注”=4。国民荣誉感“非常自豪”=1; “有点自豪”=2; “不怎么自豪”=3; “毫不自豪为”=4。对政治感兴趣的参照组为毫无兴趣。c. 政制运作效率“毫不满意”=1; “不怎么满意”=2; “尚算满意”=3; “非常满意”=4。社会问题的解决“非常可能”=1; “可能”=2; “比较不可能”=3; “不可能”=4。

资料来源: 作者自制。

的结果可见, 所有被考虑的政治参与行中里联系有影响力的人士和游行或示威对政治信任具有显著的负相关关系。游行或示威属于集体抗争的一种, 根据蔡永顺 (Cai, 2010: 44 - 52) 的研究认为此类行为要取得成功取决于两个维度: ①行动的威胁性; ②政府让步的成本。参与的人数越多威胁性越大, 政府让步的可能性也越大, 但同时被政府压制的可能性也增加。另外张泰苏 (2009) 认为相比较行政诉讼, 上访在行政纠纷中取得合意结果的可能性更低。而联系有影响力的人士则属于常规的参与行为, 如文献回顾部分所示它是一种个人通过纽带关系来影响政策结果的行为。这种行为有一定的使用门槛亦不保证能够取得合意的结果, 可以预期不同背景的市民取得的结果可能会有很大的差异, 取决于关系纽带的强弱, 可能只有少部份人能够取得成功。因此通过上述行为进行利益诉求表达获得合意结果的可能性并不高, 市民会降低政治信任就不难理解。模型 2 则只考虑了控制变量和主观绩效的影响。由结果可见, 对国家经济现状、家庭经济状况的回顾和预期、政制运作效率和社会问题解决能力的主观满意度和政治信任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模型 3 同时考虑了控制变量、政治参与行为和主观绩效的影响。在控制了政治参与行为后, 主观绩效和政治信任的关系基本没有变化。国家经济现状、政制运作效率和家庭经济预期仍然和政治信任显著相关, 而且单是前两者的标准化系数 (0.115、0.190) 的影响力 (0.305) 经已超过了所有政治参与行为的总和 (0.223), 这显示主观绩效要比政治参与行为对政治信任发挥更重要的影响。

另外，家庭经济回顾和社会问题的解决不再显著，取而代之的是国家经济回顾。可以发现，控制了主观绩效后，游行和示威仍然与政治信任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虽然政治参与行为的影响力总和仍然比不上两个单项的主观绩效评价单项。但是由标准化系数来看游行和示威是所有政治参与行为中影响力最大的一项。作为唯一可能对社会秩序构成挑战的参与行为，正如我们之前的论述所示对于市民而言这样的参与行为不单高风险，而且在解决问题上并不具有效率。然而因为和政府之间缺乏制度化的联系，尤其是单位制衰微之后，市民更是缺乏了和政府进行利益表达和博弈的场所（Shi, 1997；Walder, 1986；Tang & Parish, 2000）。游行和示威相对而言较低的使用门槛，使其成为普通市民最为常用的利益要求表达的渠道（Cai, 2008b），尤其是在政府和市民之间产生的所谓公共纠纷之中。由于维护社会稳定是对官员工作考核的重要指标^①，这使地方在应对类似行为时可能更倾向采用压制手段来平息纠纷。但由此而产生的对政治信任的负面影响亦值得政府相关部门的关注，这事实上并不有利社会的长期稳定。最后需要说明的是因为投票行为和政治信任可能存在一定的内生性问题，使 OLS 模型的估计产生偏误。幸运的是一方面我们主要关注的是比较政治参与行为和主观绩效对政治信任影响力的大小，上述问题并不阻碍我们进行这样的比较。另一方面亚洲民主调查（2008）的截面数据并未提供足够的信息容许我们做更多的工作进行修正。因此这里就不作更详细的论述。

五、结论和讨论

政治参与行为和主观绩效，那个对政治信任更有影响？本文运用亚洲民主调查（2008）的数据对这个问题进行了分析。我们的主要发现是主观绩效相比政治参与行为对政治信任有更重要影响。其中国家经济现状、政治制度的运行效率的主观满意度是两个对政治信任最有影响力的变量，单是这两者的影响力超过已经所有政治参与行为的影响。这说明目前政治信任的来源主要来自市民

^① 参考 1991 年 2 月 19 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的《关于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决定》。

主观满意度的维持和提高。政府现时以发展经济为主，兼顾社会福利并不断提高社会问题解决能力来获取政治信任的管治方式，至少现阶段来说仍然是理性和有效的。但正如赵鼎新（Zhao, 2009）对中国绩效合法性的分析所示，这样的合法性获取方式虽然能够促使官员努力维持管治绩效来维持市民对政府的支持。然而一旦政府的经济绩效下降或者承诺的好处不能兑现，合法性就会受到直接的挑战。

这显示至少两方面的原因可能使政治信任下降。第一个原因是经济的增长放缓而使政府难以有效地提高和维持市民的生活水平和社会福利。第二个原因是经济的增长和物质生活的改善使市民追求更高的生活目标，例如更个性化的利益诉求和更多的政治参与需求，这些需求难以单方面地通过经济绩效的提高来满足，比如我们开篇提到的环境邻避问题。它们更可能和经济绩效相矛盾。而且有效的解决需要对政府目前的决策和问责方式进行结构性的调整。但潜在的风险的是这样的调整可能影响经济绩效，由此而损失的政治信任亦未必能在短期内籍着政治制度化来弥补。根据已有的研究和经验观察，政府目前的应对方式是尽力地维持经济绩效同时通过更灵活的手段来吸纳市民的诉求和怨气（Cai, 2008a；何增科等，2007；周雪光，2011），在现行政治制度里释放出更多的“韧性”（Nathan, 2003），籍此维持经济增长和社会稳定之间的平衡。以上的手段目前来看是成功的，但并不代表能够长期有效。我们的模型结果亦显示游行和示威这样的政治参与行为在控制了主观绩效后，仍然对政治信任存在独立的影响。这一方面说明政治制度化的措施能够获取政治信任，但另一方面也显示缺乏制度化的途径处理市民的利益诉求会损害政府的信任。虽然模型的结果显示现阶段这些行为对政治信任的影响不及主观绩效，但考虑到我们使用的只是一定时期内的全国截面数据，无法反映两者对政治信任影响的长期动态变化，在未来经济增长预期降低和放慢，以及社会逐渐多元的利益诉求增多的情况下，两者的关系会发生怎样的变化？政府又要如何处理绩效合法性和政治参与需求两者之间的张力？以上的问题和本文的结论需要学界同行持续的关注、讨论和检验。

附表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变量名称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备注
性别	0.51	0.499	0	1	男编码为“1”，女为“0”。
年龄	47.08	15.21	18	95	
教育程度	1.58	0.574	1	3	小学及以教育程度（无正式教育、未完成小学、完成小学教育）编码为“1”，中学教育程度（未完成技校/职业教育、完成技校/职业教育程度为、未完成中学教育、完成中学教育）为“2”，大专及以上教育程度（大专、本科、研究生教育）为“3”。
家庭收入	2.07	0.761	1	3	能够储蓄编码为“1”，收支平衡为“2”，入不敷支为“3”
关注政治新闻	2.91	1.191	1	4	少于一周一次编码为“1”，一周一到两次“2”，一周数次为“3”，每天都关注为“4”。
对政治感兴趣	0.82	0.383	0	1	毫无兴趣编码为“0”，有点兴趣、比较感兴趣和非常感兴趣为“1”。
国民荣誉感	1.68	0.743	1	4	非常自豪编码为“1”，有点自豪为“2”，不怎么自豪为“3”，毫不自豪为“4”
联系官员	0.25	0.438	0	1	曾经、多于一次编码为“1”，从不为“0”。
联系人大代表	0.03	0.174	0	1	同上
联系党政机关	0.03	0.185	0	1	同上
联系有影响的人	0.14	0.351	0	1	同上
拒绝交税或费用	0.02	0.146	0		同上
游行或示威	0.01	0.106	0		同上
投票	0.74	0.434	0	1	有编码为“1”，没有为“0”。
国家经济现状	4.04	0.71	1	5	非常恶劣编码为“1”，恶劣为“2”，过得去为“3”，良好为“4”，非常良好“为5”。

(续上表)

变量名称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备注
国家经济回顾	4.36	0.642	1	5	同上
国家经济预期	4.36	0.577	1	5	同上
家庭经济现状	3.31	0.930	1	5	同上
家庭经济回顾	3.94	0.793	1	5	同上
家庭经济预期	4.05	0.727	1	5	同上
政制运作效率	3.04	0.563	1	4	毫不满意编码为“1”，不怎么满意为“2”，尚算满意为“3”，非常满意为“4”。
社会问题的解决	2.02	0.626	1	4	非常可能编码为“1”，可能为“2”，比较不可能为“3”，不可能为“4”。
政治信任因子					分析结果参考表2

注：N = 5098，缺失值被排除。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参考文献

- 何增科、王海、舒耕德 (2007). 中国地方治理改革、政治参与和政治合法性初探. 经济社会体制比较, 4.
- 胡荣、胡康、温莹莹 (2011). 社会资本、政府绩效与城市居民对政府的信任. 社会学研究, 1.
- 马德勇. (2007). 政治信任及其起源—对亚洲 8 个国家和地区的比较研究. 经济社会体制比较, 5.
- 马德勇、王正绪. (2012). 民主、公正还是绩效? —中国地方政府合法性及其来源分析. 经济社会体制比较, 3.
- 孟天广、杨明 (2012). 转型期中国县级政府的客观治理效与政治信任—从“经济增长合法性”到“公共产品合法性”. 经济社会体制比较, 4.
- 张泰苏. (2009). 中国人在行政纠纷中为何偏好信访. 社会学研究, 3.
- 周雪光. (2011). 权威体制与有效治理：当代中国国家治理的制度逻辑. 开放时代, 10.
- Almond, G. A. & Verba, S. (1963). *The Civic Culture*.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Cai, Y. (2008a). Power Structure and Regime Resilience: Contentious Politics in China. *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38 (3): 411 – 432.

- Cai, Y. (2008b). Social Conflicts and Modes of Action in China. *The China Journal*, 59: 89 – 109.
- Cai, Y. (2010). *Collective Resistance in China: Why Popular Protests Succeed or Fail*.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Chen, J. (2004). *Popular Political Support in Urban China*. Washinton, D. C: Woodrow Wilson Center Press & Stanford: Standford University Press.
- Chen, J. & Dickson, B. J. (2010). *Allies of the State: China's Private Entrepreneurs and Democratic Chan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Chen, J. & Zhong, Y. (2002). Why Do People Vote in Semicompetitive Elections in China. *The Journal of Politics*, 64 (1): 178 – 197.
- Citrin, J. (1974). Comment: The Political Relevance of Trust in Government.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68 (3): 973 – 988.
- Dalton, R. J. (2004). *Democratic Challenges, Democratic Choices: The Erosion of Political Support in Advanced Industrial Democracie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Easton, D. (1965). *A System Analysis of Political Life*. New York: Wiley.
- Gamson, W. A. (1968). *Power and Discontent*. Homewood, IL: The Dorsey Press.
- Hetherington, M. J. (1998). The Political Relevance of Political Trust.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92 (4): 791 – 808.
- Inglehart, R. (1977). *The Silent Revolution: Chaning Values and Political Styles Among Western Publics*.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Inglehart, R. (1997). *Modernization and Postmodernization: Cultural, Economic and Political Change in 41 Societies*.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Li, L. (2004). Political Trust in Rural China. *Modern China*, 30 (2): 228 – 258.
- Li, L. (2008). Political Trust and Petitioning in the Chinese Countryside. *Comparative Politics*, 40 (2): 209 – 226.
- Manion, M. (2006). Democracy, Community, Trust: The Impact of Election in Rural China.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39 (3): 301 – 324.
- March, J. G. (1988). *Decisions and Organization*. Oxford, Uk: Blackwell.
- Miller, A. H. (1974). Political Issues and Trust in Government: 1964—1970.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68 (3): 951 – 972.
- Mishler, W. & Rose, R. (2001). What Are the Origins of Political Trust?: Testing Institutional and Cultural Theories in Post-communist Societies.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34 (1): 30 – 62.

- Nathan, A. J. (2003). Authoritarian Resilience. *Journal of Democracy*, 14 (1): 6 - 17.
- Norris, P. (2011). *Democratic Deficit: Critical Citizens Revisited*.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North, D. C. (1990). *Institutions, 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Nye, J. S., Zelikow, P. D. & King, D. C. Eds. (1997). *Why People Don't Trust Government*: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O'Brien, K. J. (1996). Rightful Resistance. *World Politics*, 49 (1): 31 - 55.
- O'Brien, K. J. & Li, L. (2006). *Rightful Resistance in Rural China*.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Pharr, S. J. & Putnam, R. D. Eds. (2000). *Disaffected Democracies: What's Troubling the Trilateral Countries?*: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Putnam, R. D. (1993). *Making Democracy Work*.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Shi, T. (1997).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in Beijing*.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Shi, T. (1999). Voting and Nonvoting in China: Voting Behavior in Plebiscitary and Limited-Choice Elections. *The Journal of Politics*, 61 (4): 1115 - 1139.
- Shi, T. (2001). Cultural Values and Political Trust: A Comparison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nd Taiwan. *Comparative Politics*, 33 (4): 401 - 419.
- Tan, Q. & Qiushui, X. (2007). Village Election and Governance: Do Villagers Care?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16 (53): 581 - 599.
- Tsai, K. (2007). *Capitalism without Democracy: The Private Sector in Contemporary China*. Ithaca, New York: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Wang, Z. (2005). Before the Emergence of Critical Citizens: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Political Trust in China.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Sociology*, 15 (1): 155 - 171.
- Wank, D. (1999). *Commodifying Communism: Business, Trust and Politics in a Chinese City*.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Yang, Q. & Tang, W. (2010). Exploring the Sources of Institutional Trust in China: Culture, Mobilization or Performance. *Asian Politics & Policy*, 2 (3): 415 - 436.
- Zhao, D. (2009). The Mandate of Heaven and Performance Legitimation in Historical and Contemporary China. *American Behavioral Scientist*, 53 (3): 416 - 433.